

大国战略

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

王缉思◎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大国战略

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

王缉思◎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战略 / 王缉思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86-5894-0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
-文集 IV. ①D829.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425号

大国战略

著 者: 王缉思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613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894-0 / D · 344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的国际战略

1.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 60 年 // 003
2.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 055
3. 中国大战略求索：崛起中的强国探寻未来之路 // 065
4. “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075
5. 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 // 080
6. “西进”，是还中国以“中国”的地位 // 085
7. 东稳西进：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 092
8. 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 097

第二部分 中美之间

9.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 117
10. 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 121
11. 中美竞争，看谁先变增长方式 // 134
12. 中美一直在误读对方 // 137
13. 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 142
14. 拉登之后，美国会遏制中国吗 // 147

15. 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 // 154

16. 关于“中美战略互疑”的再思考 // 165

17. 两个领导权——中美关系的主线 // 175

第三部分 远观美国

18. 美国发展强大的原因 // 181

19. 美国外交特色及其优势和缺陷 // 209

20. 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 225

21. 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 // 240

22. 美国夸大中国实力的背后 // 266

23. 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 269

24. 克林顿的外交遗产——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归宿 // 277

25.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与布什主义 // 301

第四部分 世界政治评说

26. 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 325

27. 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 358

28. 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 // 364

29. 不必对非议中国高度敏感 // 375

30.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 380

31. 争论让国家更有承受力 // 387

32. 亨廷顿挑起的论战将超越时空 // 392

第五部分 治学与读书

33. 真正给中国读者看的国际评论——《大国心路》序 // 401

34. 美国大战略能给中国提供启示吗 // 404

35. 《国际政治研究》改版寄语 // 408

36. 中国尺度 全球视野——《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导论 // 410

- 37.《中美经贸关系》推荐序 // 417
- 38.为什么要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 // 421
- 39.读《治理中国》有感 // 425
- 40.《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中文版序 // 429
- 41.《从莱文沃斯到拉萨》中文版序言 // 433
- 42.《匈牙利事件——美国的政策与反应》序 // 438
- 43.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 444
- 44.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 // 456

第六部分 学人情怀

- 45.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学问——纪念慎之先生 // 467
- 46.汪老与中美关系 // 471
- 47.为求真知而研究 // 475
- 48.培养平等意识，做自信中国人 // 479
- 49.持平常心 做普通人 // 483
- 50.国际关系学习者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境界 // 486
- 51.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 // 490
- 52.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学者 // 493
- 53.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访王缉思教授 // 507

| 第一部分 |



中国的国际战略

1.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 60 年¹

前言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如何分期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²一些中国学者认为，1949~1989 年，中国外交在尾数为 9 的年份总是发生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从而基本构成中国外交的分水岭。³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在 1999 年发表的回顾新中国外交 50 年历程的文章里，也以每 10 年为一个阶段展开论述。⁴1999~2009 年，中国外交同样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本文以 10 年为界，分 6 个阶段来刻画中国外交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后 60 年中的变迁。这 6 个阶段分别是：

一、向苏联“一边倒”时期（1949~1958 年）。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在 1957 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确认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即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二、“反帝必反修”时期（1959~1968 年）。1959 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访

华期间，与毛泽东发生龃龉。同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先应允的核技术，这是中苏交恶的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外宣传升温，但仍坚持建立“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

三、“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时期（1969~1978年）。以1969年3月发生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为标志，“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中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按照“一条线、一大片”的思路构筑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统一战线。⁵

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期（1979~1988年）。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980年之后，“联美反苏”战略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中国外交开始强调独立自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全面改善对外关系，包括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政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增强了。

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时期（1989~1998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对中国内外政策都造成巨大冲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既强调反对霸权主义，顶住国际压力，又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瓦解了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的外交制裁，全面改善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中国汇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时期（1999~2009年）。1999年5月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严重考验。中国政府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坚持了既定外交方针。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抓住战略机遇，大大改善了国际环境。2005年，胡锦涛主席宣告：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

以上对中国外交6个阶段的概述，当然是粗略的，学术上可争论的。但是，从“东风压倒西风”到“共建和谐世界”的巨大思想转折，的确跨越了几个风云变幻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同外交进程密不可分。本文所讲的“国际问题研究”是广义的，既包括中国对外部世界与国际形势的观察，又包括政策分析与建议；既包括官方研究机构的设置与发展，又包括高校教学科研单位等非官方机构的成长与研究成果。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与中国外交从遭受遏制、封锁、孤立到全方位开拓进取的进程同步，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粗到精、从“一言堂”到多元化、从为政



策做注解到向政府建言、从单一的意识形态挂帅到各派学术理论相互竞争、从仅有一两家教学研究单位到数十个国际问题研究院系蓬勃发展的曲折进程。

本文旨在梳理 60 年来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文章大量的篇幅用在了外交思想与实践方面，但最终落脚点却在这一领域的中国专家学者今天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研究水平。我们还希望让读者通过本文，了解“国际问题”这一学科领域在国内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⁶

在每一节论述之前，我们都摘录一段那一时期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政策声明，目的是为了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外交经历过的不同时代，以及当时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所处的政治语境。

第一个 10 年（1949~1958 年）：“东风压倒西风”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⁷

1949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先后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⁸、“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⁹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一边倒”战略，即与苏联结成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一战略不仅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第一个 10 年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学习苏联。“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¹⁰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是如此。

“一边倒”外交的重要依据是“两大阵营”理论，毛泽东 1949 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 5 篇文章，为“两大阵营”理论定下了基调。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美苏冷战加剧，美国把中国视为苏联的“附庸”，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政策，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和战略联盟。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成立，两大阵营正式形成并巩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对台湾海峡实行军事封锁，保护台湾国民党当局，使中国领土受到割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迫使美军撤退到北纬38度线以南。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希望中朝尽快同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当年7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1954~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完成了几项重大军事行动，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也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的联合外交行动暂时维持了那一地区的和平。通过在朝鲜、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的军事和外交较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10年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了基本保障。

正像上文所引用的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所说，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和“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加强同苏联东欧集团的团结。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只能依赖苏联东欧国家的宝贵援助，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系。

然而从斯大林逝世开始，所谓“牢不可破的，永恒的”中苏友谊就出现了明显裂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随之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国内政治动乱，西方加以煽动和利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公开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动态，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产生担忧。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以支持中东国家反美斗争为由的炮轰金门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倾向的怀疑，为中苏公开分裂和“一边倒”战略的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虽然中国承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以苏联为首”，但毛泽东对于在意识形态上无所建树而又诋毁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一直是不服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因此而日益突出。

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本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道：“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



占了压倒的优势。”¹¹也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完全超乎实际的目标，即苏联和中国要在15年时间里，从经济上赶超美国 and 英国。由此看来，1958年中国的经济冒进，以及其后的“左”倾错误，部分源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是同邻国发展友好往来以稳定周边，同亚洲、非洲其他国家增加交流，以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扩大反帝统一战线。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一直认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夹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必然在这一地带展开争夺；中国同亚非拉广大新独立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应当互相支持。对苏关系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嫌隙，中国加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援助，显得尤为迫切，而中国后来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焦点之一即是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态度问题。

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成为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1954年，在周恩来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确认它们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上，中国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积极倡导指导一切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功。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头一个10年处于初创阶段。50年代中期以前，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只有一本属于普及性、知识性的刊物《世界知识》，国际问题图书的出版也十分有限。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缓和、对外交往扩大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于1955年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一度改称“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归属外交部领导，是第一所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独立的高等学府。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¹²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加强国际问题研究采取了一些措施。1956年1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之一、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利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时机，主持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接受了张闻天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直

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改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56年11月，该研究所成立，成为启动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第一家研究机构。同年，国家计委设立了世界经济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也设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组。¹³此后，在上海和广州分别成立了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东南亚问题的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在这一时期建立，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资料和成果的翻译及出版。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比如张闻天、李一氓、宦乡、陈忠经、钱俊瑞、刘思慕等，他们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贡献尤为杰出的是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他在驻苏使馆期间建立了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向国内报回了不少重要情况和对策建议。在1955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以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闻天负责组建了三个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的机构，即上文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基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独立思考，张闻天的外交思想独树一帜，与当年外交工作中的一些激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惋惜的是，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从此被剥夺了为外交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服务于“一边倒”的大战略，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时研究的另一个侧重点，是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国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还有一些内部报告分析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旨在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联络和信息工作。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供领导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政策研究报告，独立研究的学术著述尚未出现。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教学，无论是研究主题、机构设置，还是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均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第二个10年（1959~1968年）：“反帝必反修”

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



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¹⁴

1959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影射指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赫鲁晓夫访美时声称“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在参加新中国十周年大庆期间，赫鲁晓夫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会谈中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同年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针对苏联“朋友”写道：“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同年，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¹⁵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逐步升级，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曾被称赞为“坚如磐石”、“亲如兄弟”的中苏同盟最终走向了破裂。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苏间的论战半公开化。同年，苏联政府中止对华援助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1960~1962年中国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苏联撤销对华援助被归结为一个重要原因。

从1962年开始，中苏在苏美缓和、古巴导弹危机等诸多国际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明显。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内外政策。中国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对派”为己任，对苏联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同美国搞缓和与妥协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和爆发世界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几次集中谈到“中间地带”问题，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¹⁶

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挤压下扩大外交空间，打破孤立，中国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十分重视同“两个中间地带”里的国家发展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增进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3年年底到1964年年初对亚非14个国家的访问。中国同缅甸等邻国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加强睦邻友好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同日本及一些西欧国家建立了商务关系。

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斗争”，同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国内任务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毛泽东在1965年告诫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此时中国国内政策中的极“左”倾向日益突出，反过来又将外交政策推向更为激进的方向。1965年3月，中国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6月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¹⁷中国对外政策“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从此成型。1965年9月，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之后，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要以“世界的农村”（广大亚非拉国家）来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¹⁸

中国对世界革命做出的最大贡献和牺牲，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的抗美援朝斗争。为支持越南抗击美国侵略，1965~1968年，中国先后派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等兵种的援越部队达32万余人，最多的一年达17万余人。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越南巨大的援助，仅物资援助折价就达人民币200亿元，而此时中国自己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¹⁹但是，越南却从未明确支持中国的“反修斗争”，而是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从苏联取得了大量援助。

1966年6月正式拉开帷幕的“文革”，对中国外交形成了巨大冲击。这时中国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严重偏离了实际，认为世界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而中国处于“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考虑到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美帝国主义仍被视为主要敌人和



头号战略威胁。²⁰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宣称：“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反美）统一战线之内。”²¹

在“文革”时期，中国外交领导部门和驻外机构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67年1月，“造反派”在高层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外交部门已无法正常工作，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1967年8月22日北京万人围攻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同一些国家断交。为了克服外交混乱造成的危害，从1968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正，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陆续得到修复和发展。然而，中苏关系仍在恶化过程中，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1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不深深留下那个革命时代的烙印。中苏开始意识形态论战之后，中国报章不再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是重点批判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也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和国内“反修防修”的需要。在“九评”中，还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和平演变”，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一观点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意识形态上的铺垫。²²

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经由中央编译局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对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有过多次指示。“灰皮书”的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²³

60年代初，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在1961年说：“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²⁴毛泽东还要求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